

情緒行為障礙學生社會行為評量之議題與 啟發：以「多元資料提供者」觀點為例

蔡明富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特教系教授

張俊賢

高雄市南成國小資源班教師

摘要

本文主要探討情緒行為障礙學生的社會行為評量（包括社會能力及問題行為）需要納入多元資料提供者的訊息。從過去研究發現，不同情境評量者間差異性則多數達到顯著差異，評量者間一致性多為低度到中度相關，證實多元資料提供者在評量社會行為的認知一致性低、差異性大，故情障學生鑑定時，採用跨情境的多元資料提供者訊息有其必要性。

壹、前言

在特殊教育領域中，根據教育部 102 年公布的「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辦法」第九條針對情緒行為障礙學生（以下簡稱情障學生）之鑑定基準，明定情緒行為障礙學生其鑑定需要符合跨情境指標：「除了學校以外，在家庭、社區、社會或任一情境中，顯現適應困難」。上法規得知，情障學生的評量來源，需要兼顧教師、家長等不同情境評量來源。DSM-5 亦強調 ADHD 診斷需要以跨情境來評估不專注、衝動及過動症狀，如學校、工作或家庭（APA, 2013）。由於 ADHD 易出現注意力缺損、人際互動的困難、衝動性或過動性，這些特徵將導致個案在學校、家庭或任何情境中，出現嚴重的行為、學習、情緒和適應問題，上述問題往往影響個案在不同情境的生活適應。故蔡明富（2016）指出其社會行為評估宜納入多元資料提供者（multiple informants）所提供之訊息。

既然評量情緒行為障礙學生的社會行為，需要蒐集兩種以上的情境（如家裡或學

校）的兒童行為資料，不同的資料提供者就扮演起重要的角色。惟目前國內針對評量情障學生社會行為宜採多元資料提供者觀點，甚少著墨，本文將針對此議題進行深入探討，並提供未來的啟發。

貳、社會行為評量內容與方法

一、社會行為評量內容

社會行為評量內容應包括正向行為與負向行為，正向行為以評估社會能力為主，而負向行為則以問題行為為主。評量情障學生社會行為的目的，除了發現個案的問題行為外，更積極的意義是評估完成後如何提供必要的介入方案，減少學生的問題行為，或降低問題行為對學生所產生的負面影響。因此評量學生社會行為時，除了問題行為的評量外，也應納入評量社會能力，以利全面評量學生之社會行為現況，以及爾後教育的實施（蔡明富，2015）。

二、社會行為評量方法

評量兒童青少年的社會行為的方法有多

種，常用的方法包括行為評量表、直接觀察、晤談、社會計量法。其中，以「行為評量表」最常應用於個案評估工作上（Elliott & Busse, 2004）。相較於觀察、晤談或社會計量法需要耗費較多的時間，且需要較多的訓練，行為評量表在運用上顯得較有其優勢，蔡明富（2015）綜合整理文獻則認為，採取行為評量表評定個案的社會行為，有以下優點：可以反應長時間與不同情境的觀察結果，並反應出評量者對受評者表現行為的意義、較直接觀察法經濟且有效率、容易進行信效度研究，及進行全國常模。此外，行為評量表也常被批評為評量結果易受到評量者主觀的因素影響。由於不同情境會影響學生的社會行為表現，加上不同情境下（如家庭或學校）成人對學生的行為標準不同，不同評量者的觀點對學生的行為有不同的評價。故未來進行情障學生社會行為之評量，如何善用行為評量表的優點，避免評量者主觀意識而影響社會行為評量結果客觀性，值得加以探討。

參、社會行為評量之多元資料提供者研究議題

教師與家長均是學生社會行為評量的資料提供者，過去已有許多研究在探討不同資料提供者間同意度（informant agreement）情形，就這些研究重點可分為以下兩種議題：差異性（discrepancies）及一致性（correspondence）（Reyes & Kazdin, 2005），以下將分從差異性及一致性議題研究進行探討。

一、評量者間差異性的相關研究

不同評量者差異性的相關研究，可分成兩方面：

（一）教師、家長與學生間差異性研究：

Donna、Lisa、Heather 與 Cynthia（2009）探討教師和家長評估罹患亞斯伯格症兒童、青少年的社會技巧表現，評量結果發現雙方

達統計上的顯著差異。Munkvold、Lundervold、Lie 與 Manger（2009）以 7~9 歲的兒童參與了 BCS（The Bergen Child Study）計畫，由家長和教師填寫 SNAP-IV 工具來測量 ODD 症狀，研究結果顯示，不同來源的訊息兩者報告結果也達統計上的顯著差異。Antrop、Roeyers、Oosterlaan 與 Van Oost（2002）請家長與教師填寫干擾性疾患評量表（Disruptive Behavior Disorder Rating Scales），結果發現家長報告的不專注與過動衝動症狀，明顯高於教師報告。Huang 等人（2004）探討高危險群兒童 58 名，並與對照組 116 名兒童做比較，請父母、教師分別填寫「家庭情境問卷」與「兒童注意力量表」，結果顯示雙方的評量結果達統計上的顯著差異。Salbach-Andrae、Lenze 與 Lehmkuhl（2009）調查家長、教師、青少年關於在使用兒童行為檢核表、教師報告表格、青少年自陳量表等來評量 681 位罹患精神障礙青少年問題行為的同意度，結果顯示不同的資料提供者間同意度得到低度到中度相關。楊雯婷（2015）針對 30 位國小五、六年級 ASD 資優學生，由學生的教師、家長及學生本身分別填答國中小學生社會行為評量表，研究發現在社會能力與問題行為的三方填答結果皆有達到統計顯著差異。惟有少數研究發現教師及家長填答結果無顯著差異，如 Mitsis 等人（2000）發現家長報告的 ADHD 症狀與教師無差異。上述多數研究支持教師、家長與學生本身填寫個案的社會能力及問題行為呈現顯著差異。

（二）家長間差異性研究：

Duhig、Renk、Epstein 與 Phares（2000）採用後設分析（meta-analysis）針對 60 篇包含母親與父親資料提供者的研究進行分析，發現母親對兒童的內外化問題報告，傾向比父親報告的較嚴重，但差距小且未達顯著。許瑞玟（2006）針對 39 名 ADHD 兒童的母親、父親分別填答「干擾行為評量表」、「兒

童行為檢核表」及「教師報告表」，研究結果發現，父親、母親在 ADHD 症狀嚴重度的報告上，並沒有顯著差異。顯示家長間填寫的評量結果得到無顯著差異。

二、評量者間一致性研究

不同評量者間的相關研究，可分成兩方面：

(一)教師、家長與學生間一致性研究：

國外 Achenbach、McConaughy 與 Howell (1987) 針對 119 篇兒童行為問題的文獻進行後設分析，發現多元資料提供者（教師、家長及學生本身）對兒童問題行為看法的平均相關為.28。以臨床轉介兒童為樣本時，Briggs-Gowan、Carter 與 Schwab-Stone (1996) 以教師、母親與兒童為報告者，發現三種資料提供者對內化與外化問題達低至中度顯著相關，範圍為.16 至.50。其他以 ADHD 個案為樣本的研究中，教師與家長間之相關也未盡理想，Antrop 等人 (2002) 以 ADHD 為樣本，發現教師與家長在不專注、過動衝動向度的相關分別為.13 與.09，且針對個別症狀之多數相關結果均未達顯著相關。Satake 等人 (2003) 曾對 316 名情緒行為問題兒童進行教師與家長評量一致性研究，結果發現教師與家長所評結果為.16~.36 之間。

國內研究發現，Huang 等人 (2004) 請父母、教師針對案例填寫「家庭情境問卷」與「兒童注意力量表」，結果顯示不同訊息提供者間之評量，在「兒童注意力量表」的過動分數上呈現低度相關外，在不專注量表則無顯著相關。許瑞紋 (2006) 調查 39 名初次臨床診斷為 ADHD 的兒童及其母親、父親與教師，研究所採用的工具包括：干擾行為評量表家長版、干擾行為評量表教師版、兒童行為檢核表、教師報告表，探討 ADHD 兒童之教師及家長評量的一致性，發現母親與教師報告達顯著低至中度相關，父親與教師報

告只有低度相關且未達顯著。張琇茹 (2010) 由父母、教師填寫「兒童行為檢核表」評量外籍配偶子女，與本國子女的行為表現。得到結果顯示，父母、老師評量孩童內化、外化行為問題的一致性並不高。然而外化行為的一致性，比起內化行為是比較高的。王亦萱 (2014) 研究 6-12 歲且智能在正常範圍 (IQ > 70) 之 ASD 組與 ADHD 組兒童，經年齡及智能配對後，兩組各有 35 名，共計 70 名兒童，教師與家長評量之一致性分析顯示，ASD 組在內化、焦慮／憂鬱、注意力問題及違規行為分量尺的評分達中度顯著相關，外化量尺與社會問題分量尺則達低度顯著相關；ADHD 組之家長與教師在外化、社會問題、注意力問題及違規行為分量尺評分達中度顯著相關。蔡明富 (2015) 在發展編製「國中小社會行為評量系統」，由教師、家長、學生（國小五到九年級），填答「社會能力量表」與「問題行為量表」。得到結果發現評量者間一致性僅出現低度至中度相關，而且以低度相關佔多數。另發現三種評量表的社會能力量表的評量者一致性高於問題行為量表的評量。由上述國內外研究結果發現，多元資料提供者間（教師、家長及學生本身）評定兒童社會能力與問題行為僅有低至中度相關。

(二)家長間一致性研究：

許瑞玟 (2006) 針對 39 名 ADHD 兒童的母親、父親分別填寫「干擾行為評量表」、「兒童行為檢核表」及「教師報告表」，結果發現，父親、母親在 ADHD 症狀的評估結果達中度相關。

三、小結

上述關於多元資料提供者評量社會行為的差異性與相關性研究，在「不同情境不同評量者」方面，發現在社會能力及問題行為評量中，多數研究發現評量者間差異性有達顯著差異，且評量者間一致性僅出現低度至

中度相關，而且以低度相關佔多數。在「相同情境不同評量者」方面，發現在社會能力及問題行為評量中，多數研究支持評量者間差異性無顯著差異，評量者間一致性出現中度相關。顯示「不同情境不同評量者」在社會行為評量會出現差異大、一致性不高現象，惟「相同情境不同評量者」則出現差異性不大、一致性較高情形。

肆、結論與啟發

本文主要探討在情障學生的社會行為（包括社會能力、問題行為）評量，「行為評量表」是用來做為評估個案重要工具。評量來源需蒐集兩種以上的情境（如家裡或學校）資料，不同的資料提供者扮演重要角色。針對本文的探究多元資料提供者在情障學生社會行為評量之結果，提供以下建議供研究者參考：

一、行為評量表具備多項優點，是廣被使用來做行為評量的重要工具。從過去研究發現，評量者間一致性多為低度到中度相關，評量者間差異性則多有達到顯著差異。研究結果顯示多元評量者的認知一致性低、差異性大，故各方提供的訊息都有其重要性。進行情障學生的鑑定評量時，需蒐集跨情境、多方訊息提供者（例如從家長、教師等重要他人）的評估資料顯得相當重要。

二、在評量情障學生社會行為表現時，應結合多元資料提供者的觀點，以利評定的結果更客觀。上述文獻探討得知評量訊息的提供者多數參考教師、家長的觀點，但學生本身對自我的看法也應該納入考量，故學生自評觀點在未來情障鑑定亦是可納入的重要參考來源，方可得到整體社會行為表現的全貌。

三、此外，過去文獻發現在相同情境下不同資料提供者的研究，結果發現家長間（父親與母親）在社會行為的評量結果差異不大

且相關性較高，此結果顯示未來進行情障鑑定時，在家庭情境下，可考慮採母親或父親單一評量者提供評估結果。

四、針對外向性、內向性問題行為的評量結果，結果顯示，父母、教師評量孩童內向性、外向性問題行為的一致性並不高。惟外向性問題行為的一致性，比起內向性問題行為是比較高的。由於外向性問題行為因為顯而易見，故教師、家長的觀點會更一致。因此，未來不同評量者在評估學生的問題行為時，宜留意教師、家長對外向性問題行為的看法一致性較高，內向性問題行為一致性較低現象。

參考文獻

- 王亦萱（2014）。以阿肯巴克實證衡鑑系統評估臺灣自閉症類群障礙與注意力不足過動症兒童之情緒與行為問題研究。臺北市立大學心理與諮商學系碩士論文，未出版，臺北。
- 許瑞玟（2006）。注意力缺陷過動症臨床樣本之症狀評量：多元資料提供者之比較。長庚大學臨床行為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桃園。
- 張琇茹（2010）。台南市外籍配偶子女在父母與老師評量孩童行為問題的一致性。國立成功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台南。
- 楊雯婷（2015）。自閉症類群障礙資優學生之社會行為表現。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碩士論文，未出版，高雄。
- 蔡明富（2015）。國中小學生社會行為評量系統之發展。*特殊教育學報*，**41**，83-120。
- 蔡明富（2016）。ADHD、ASD 與 ADHD 共病 ASD 疾患臨床特徵之探究。載於**中華民國特殊教育學會 105 年刊**，95-105。臺北：中華民國特殊教育學會。
- Achenbach, T. M., McConaughy, S. H., & Howell, C. T. (1987). Child/adolescent behavioral and emotional problems: implications of cross-informant correlation for situational specificity.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01*, 213-232.

- Antrop, I., Roeyers, H., Oosterlaan, J., & Van Oost, P. (2002). Agreement between parent and teacher ratings of disruptive behavior disorders in children with clinically diagnosed ADHD. *Journal of Psychopathology and Behavioral Assessment, 24*, 67-73.
-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2013).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5th ed.). Washington, DC: Author.
- Briggs-Gowan, M. J., Carter, A. S., & Schwab-Stone, M. (1996). Discrepancies among mother, child, and teacher reports: Examining the contributions of maternal depression and anxiety.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24*, 749-765.
- Donna, S. M., Lisa, A. R., Heather, W. & Cynthia A. M. (2009). Parent and Teacher Report of Social Skills in Children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 *Language, Speech, and Hearing Services in Schools, 40*, 109-115.
- Elliott, S. N., & Busse, R. T. (2004). 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 of students' behavior and intervention outcomes: The utility of rating scale methods. In R. B. Rutherford., M. M. Quinn., & S. R. Mathur (Eds.), *Handbook of research in emotional and behavioral disorders*(pp.123-142). New York, NY: The Guilford Press.
- Huang, H. L., Chao, C. C., Tu, C. C., Kuo, Y. H., & Yang, P. C. (2004). Behavioral assessment of inattention and hyperactivity in Taiwanese preschoolers: Comparison among multiple informants. *Archives of Clinical Psychology, 1*(1), 57-66.
- Mitsis, E. M., Mckay, K. M., Schulz, K. P., Newcorn, J. H., & Halperin, J. M. (2000). Parent-teacher concordance for DSM-IV attention-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 in A clinical-referred sampl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iatry, 39*, 308-313.
- Munkvold, L., Lundervold, A., Lie, S. A., & Manger, T. (2009). Should there be separate parent and teacher-based categories of ODD ? Evidence from a general population. *The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50*, 1264-1272.
- Reyes, A. D. L., & Kazdin, A. E. (2005). Informant discrepancies in the assessment of childhood psychopathology: A critical review,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further study.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31*(4), 483-509.
- Salbach-Andrae, H., Lenze, K., & Lehmkuhl, U. (2009). Patterns of agreement among parent, teacher, and youth ratings in a referred sample. *European Psychiatry, 24*, 345-351.

